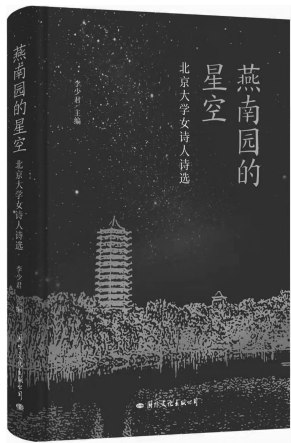


如何处理“一”与“多”?

□罗雅琳



2022年11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李少君主编
《燕南园的星空》

古典文学大家程千帆先生曾发现,中国古代诗歌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与“多”的对照形态,以此呈现出有限和无限、短暂和永恒、渺小与崇高之意蕴,也带来了节奏的起伏、疾徐、动定,进而在短小的篇幅中营造出深广的诗意。事实上,“一”与“多”的对照不仅存在于古诗中,而是成为一种贯通古今的母题与结构。在新出版的诗集《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李少君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1月版)中,我们同样能见到“一”与“多”这组对照关系所发挥的持久影响。

这本诗集的副标题中有三个关键词:北大、女、诗人。这三个关键词,都标出诗集作者具有某种特殊的身份。“北大”预设着太多关于启蒙、革新与精英的立场,“女性”暗含着性别态度,“诗人”则总是被视为先知先觉者。相对于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的“多”,这三个关键词似乎在期待着甚至要求着作者能够成为那个作为独异者的“一”。确实,读者能在诗集中读到这样一些句子:“树籽从哪里落下/哪里就顶起一片泥土”(顾春芳《燕南园》);“我即将化为山峰/从这里猛烈地吹过”(顾春芳《山风》);“我多么确信未来,隔壁有人翻阅我的诗”(白尔《午日餐厅》)。这种对于强大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确认,正

是关于独异者的经典想象模式。

但诗集中的另一些表达,展现出这种独异者想象的诗学复杂性。在本书第一首诗、秦立彦的《迎春花》中,开头两段塑造出迎春花的孤傲形象:在雾霾里、在雪天、在水泥路边、在隆隆车声之中,迎春花依然绽放,“仿佛一盏盏灿烂的灯”——在这种“一”与“多”的对照模式中,迎春花是混乱世界中的清醒者与独异者。然而,接下来的诗句却陡然一转:“它们只有一个执著/就是抓住永恒中这属于自己的一瞬/它们把全部热情都贯注于此。”迎春花“只有一个执著”,也即这里的独异者并不具有无限主体性和强大能动性,而是对于自我的限度有清醒认识;但迎春花依然要将“全部热情”投入到在“永恒”中追求“一瞬”的行动,也即其独异之处并不在于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姿态,而是在于一种双重性:既充分明白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又依然意识到个体能力十分有限。这种双重性,也是“北大”“女性”和“诗人”在当代文化领域中正在遭遇着的双重性。

《迎春花》一诗的末尾写道:迎春花的盛开源自“过去一年的沉默”,源自“忍耐寒冬和别的一切”。有趣的是,“忍耐”及其近义词在整部诗集中出现得极为频繁,如:“若能凭着热爱和忍受继续/我就能接通生命的核心运化能量”(周瓚《决意》);“为此,诗人创造了爱/但你是否也附赠了耐心与希望”(周瓚《遗珠,或踪迹》);“忍耐这酸楚,浪花苍白”(马雁《爱》);“生活里那么多不确定需要忍受/你企图用手摁平一朵波浪/你等待一个丈夫变成情人”(黄茜《大雨澳斯特的早晨》)……“忍耐”有三重意味:“忍耐”的前提是痛苦,是在他人习以为常之处发现荒谬,这源自敏锐的诗性感受力;选择“忍耐”,是因为力量有限;而这些诗句中的“忍耐”往往与“热爱”同时出现,于是,“忍耐”不再意味着消极,用尽全力去“忍耐”和用尽全力去“热爱”一样内蕴着无限的生命力,只是其所作用的方向不同。

通过强调“忍耐”的意义,这部诗集扭转了关于独异者的经典想象模式。“忍耐”关联着一种古老的民众生活逻辑。在多方言

中,“受”意味着对日常与苦难的拒绝批判和默默承受(如“受苦人”这一称谓)。读者或许会不无惊讶地发现,这部诗集中的一些作品不是在张扬某种敢为人先的精英价值或是批判庸众的启蒙立场,反而对普通人与日常生活频频萌生羡慕:“我没有的那些名词,那些据说/是让人发光和健康的东西”(康宇辰《成都一夜》);“你在四十岁上又添了小女儿,我说/三姐好福气,你确实满意”(李琬《三姐》)。在这里,日常生活对于敏感者所承受的痛苦而言竟具有救赎般的意义:她们自知是作为独异者的“一”,却没有选择以“一”去批判“多”,而是对“多”所包含的日常性致以较多的肯定——虽然也并不认为“一”可以成为“多”。

考虑到诗集作者们所具有的女性身份,这种日常性变得更加意味深长。集子中有不少作品与诗人们作为母亲的日常体验有关,而她们似乎较少地以某种先验的女性主义立场对“母职”展开批判,而更多地从孩子身上发现了一种与他人相联结的可能性。如谢竺知虽然十分珍惜“送孩子去幼儿园后”的私人时光(《一朵白云》),但孩子无条件的信赖也让她感到格外惊奇:“我做了什么,值得你这么爱我?”(《珍珠》)。张慧君同样“惊奇”地发现,孩子的诞生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圆”:“我不再在自身之中经历台风/熔岩喷发、狂涛巨澜和痛苦的爆裂/也接受了我那不外露的犀利和讥刺/我顺从于人的孤独/也愿你我之间/无伤害无罅隙”(《惊赞》)。“孩子”以原初性的“爱”化解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更以其纯真无垢化身为诗人心中的理想世界。

“一”与“多”既是理解这部诗集的一条线索,更是理解诗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切口。在这部由北大女诗人所创作的诗集中,作为“一”的独异者与作为“多”的世界逐步和解。这里的“一”渐渐洗去了某种纳雍思式的自恋自赏,但也并未放弃对个体生活感觉展开“特殊化”描摹的诗学使命。

这样的“一”不再是从世界中抽身而出的孤立个体,而是将世界包含在自身之中——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部体系化的散文诗诗学专著

□王慧琪



2022年8月
苏州大学出版社
秦兆基著
《散文诗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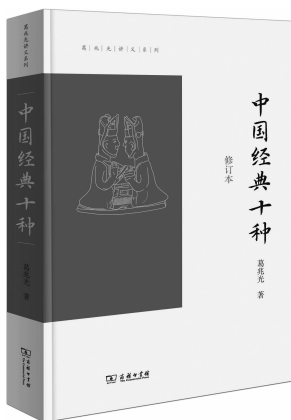
这本二十多万字的散文诗纯理论著作,秦先生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完成,他在自序里饶有诗意地说:“从2017年初夏紫薇、木槿初绽到今年(2020年)寒梅着花。”但我知道,秦先生为这部书做基础性的积累,或者说发力前的热身至少已在三十年以上了。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率先做过一些对彼时国内的散文诗创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普及性工作,出版过由他编选的《中国现代抒情散文诗选讲》《中外散文诗经典作品评赏》《散文诗写作》等在广大读者和散文诗写作者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本书。进入新世纪后,他在散文诗的理论建设上,不断奉献出新的成果:出版了以评论散文诗为主或专论散文诗的诗论集共三部,包括《永久的探寻》《诗的言说》和《散文诗野》。其间还独辟蹊径,写出了一部对其诗学主张大胆创新实践的散文诗集《揉碎江南烟水》。而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为了这部《散文诗诗学》做的铺垫。好比造塔,前面这三十多年,他不辞辛劳,一层层地建造塔身,如今,他把成竹在胸的塔尖一气呵成。

散文诗作为外来文体立足华夏已有一百五十年,但一直缺少一部结构完整的体系化的散文诗诗学专著。秦先生在对其他文体体系化研究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诗、散文、小说、戏剧等,都有相当丰硕的成果”,“即便是后出的新兴文体,如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等,也早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唯独散文诗显得“岑寂”。而所谓体系化的散文诗学,秦先生是这样定位的:“即能从文学诗学出发,总揽散文诗发展历程和全局,揭示散文诗美学本质及其可能性。”积多年的研究与思考,秦先生为他这本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散文诗诗学》搭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基本框架,其实是用丰厚的素材和缜密的评述建造起三个板块。第一板块为散文诗史。论述散文诗文体的萌生、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中国散文诗的形成、发展、繁荣及现状,探究其移植到华夏以后形态和特质的变化。第二板块为散文诗本体论。着眼于从多个角度全面揭示文体的内涵,界定其外延,论述其特性、结构、类别、意象、境界和语言运用等问题。第三板块为散文诗创作论和鉴赏批评论。指涉散文诗的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论述散文诗创作和鉴赏、批评的心理流程及需要把握的要则。全书分为十章对这三大板块进行解构,深入探讨了散文诗诗学及其整体构建、散文诗文体的最初成型与流变、中国散文诗百年回眸、散文诗结构的美学意义、散文诗分类、散文诗意象的制作和运用、散文诗中的境界、散文诗语言、散文诗的创作反思、散文诗鉴赏与批评等十个专题。全书以历史诗学、理论诗学和相邻学科理论为支撑,多角度展开对散文诗本体进行纵向和横向考察,立足本土且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又从中西诗学融合的角度,对中西诗学碰撞所导致的文体新变、散文诗的发展方向和一切可能性做出了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评判与预示。

秦先生不仅在语文教育上享有盛名,而且涉足门类文学评论和苏州地方文化历史的研究,皆有建树,著作丰沛。这部最新出版的《散文诗诗学》依旧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即理论上他善于追本溯源,写作上则文采斐然,语言尤为灵动,虽是理论著作,但读来如泉水出山,清新活泼,耐人寻味。

述写“经典”的经典

□陈雯



2022年9月
商务印书馆
葛兆光著
《中国经典十种》

近日,著名学者葛兆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葛兆光讲学系列”,其中收入了载誉三十年的经典文史通识教材《中国经典十种》。葛兆光说,这是一本通俗的讲义,是给大学生,尤其是非文科大学生“常识”的书。只要“它还‘有用’”,就说明如今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还需要对传统中国经典的阅读”,而本书“所诠释的‘旧经典’”也将成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能够成为今天生活中起作用的‘新经典’”。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典”呢?典者,经也;经者,恒也。(王符《潜夫论·赞学》有言:“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文心雕龙》又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书中所举,为儒、释、道、制、字、史。从上古的“文王演《周易》”,到中晚

唐的《坛经》中国禅,中国的历史翻过了几千年,中国人留下的文字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出、藏、显、灭。儒家治世之作,佛教治心之作,道教治身之作,历史学之典范,文字学之瑰宝,林林种种,诸子百家,有的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有的则流传下来,从普通的文本变成后世供奉的宝典。这些宝典记载着创作者的目之所见、心之所想,同时也因其流传而反映着历代度藏者、传抄者的思想与世界,甚至到了现代中外交流最频繁的时候,也因不同角度的解读而重焕光芒。

举《周易》为例,源出上古的卜筮之术,言天指地,为众人行事预“兆”,史迁言其为文王所演,从龟著为材变而以八卦为媒,而后仲尼为传西周之礼乐,复载之于典,使之成为“群经之首”。这是从巫到儒的过程。从战国到秦汉,“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有足够的自信,他们有点儿不太相信占筮偶然的結果,能完全决定个人、家族与国家的吉凶祸福了”,“于是开始在‘筮’的基础上加上了‘德’的作用”,天意之外,累以人功,著以《十翼》,大讲哲理。这是从术至道的过程。汉末魏晋,玄学盛行,人生苦短,宇宙恒远,人们于天人之际,读《周易》而得许多本原之思、有无之辨,故又提供了一种朴素的本体论,成为中国哲学的根源之一。而至宋代,佛、道至盛,儒学重起,于激烈的思想大辩论中,《周易》再次为中国本土的思想家们提供一个涵括“宇宙、社会、人类一切问题的起源、结构的图式,用它来充当观念的基石”,阴阳之变,太极图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最重要的底色之

一。此后古代中国的玄学、炼丹术、医学、天文历算,无不有《周易》的影子在。及至当代,西方的莱布尼兹从《周易》阴阳二爻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中,又看出了“二进位制”,与近代数学的原理相呼应,其中智慧,生生不息。

能成为“经典”的书,首先是能经受时间考验之书,载者多为常理,辨之时有心得;然后是历代学人反复引用、解释,内涵能够不断扩大之书。所有的“经典”,都不会永远停留在刚刚创作的那个时代,而是会随着人类社会、思想、技术的更新而不断丰富,自一小书,成大体系,延转数千年。后人在阅读经典时,不仅在学习前贤的道、术,也在与智者相辩,与智者相友,得知己,出新知。今人对经典所涵括的数千年演变也是如此。葛兆光说:“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用一句理论的话讲,就是要‘创造性地转化’。”

在这些中国古代经典中,有思想,有想象;有制度,有仁德;有“小学”,有“大学”;有观心,有修身;有正己,有平天下。阅读它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广阔的、关于过去时空的世界。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涉及的不仅是中国的思想、历史和制度,也有中国对外来文化最包容圆融的一部分。它们记载恒常之理,录写千年之事,叙述中外交往,细描人心得失。重读这样的“旧经典”,将为今天的生活提供犹有裨益的“新经典”。